

泰国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中等国家”的地缘引力平衡策略

周方冶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近年来,针对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政治压力,泰国形成了“中等国家”及对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的自我定位。泰国认为,印太战略的根源在于地区秩序重塑,将会增加地区安全风险,但也会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并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构。于是,泰国采取了“以中美为主轴,保持地缘平衡;以日印为两翼,分散大国引力;以东盟为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积极地缘策略,试图通过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平衡,从而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对此,中国有必要重视泰国的次区域支点作用,防范政治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巩固经济优势,拓展文化纽带,稳步推进中泰战略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印太战略;美泰关系;中泰关系;地缘引力结构

中图分类号:D83/8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20)02-0071-20

DOI:10.14073/j.cnki.nywtj.2020.02.006

近年来,印太战略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动下,开始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各主要国家及部分域外大国的重要议题。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印度、法国等国都相继出台了各有侧重的印太战略(或印太构想)。2019年6月,第三十四次东盟峰会在轮值主席国泰国首都曼谷闭幕。会议通过《东盟印度洋-太平洋展望》(以下简称《东盟印太展望》),从而正式阐明了东盟国家的印太共识。^[1]那么,作为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交界处的美国盟友与东盟创始国,泰国对印太战略如何认知?如何反应?本文将对此加以探讨与分析。

一、泰国应对印太战略的出发点与立足点

在学术研究中,泰国通常会被列入“小国”范畴,其著名的“风中竹”外交更被视为小国外交典范。^[2]但在泰国外交实践中,并不认同“小国”身份,而是将“中等国家”作为国际交往与地缘博弈的出发点。对此,泰国总理巴育·占奥差在2015年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经常期望大国帮助小国,但鉴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差距不断扩大,我们决不能忽视中间力量。中等国家构成

收稿日期:2020-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促进民心相通的路径与举措研究”(18BGJ077)

作者简介:周方冶,男,浙江杭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昆明)南亚东南亚研究院泰国研究所名誉所长,政治学博士。

了国际社会的大多数……可以成为大国与小国的重要纽带。”^[3]

尽管泰国所指称的“中等国家”并不是像澳大利亚或韩国那样拥有较高综合国力门槛的“中等强国”,而是采取了更为宽泛的模糊界定,以使其能被涵盖在内,但其在概念运用过程中所体现的地缘政治能动性与其自信,特别是对“大国/小国”二分法使其在地缘政治博弈中处于被动地位的不满与抵制,却是清晰可见的。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二部分“外交事务”中明确提出,在未来20年国际与地区格局面临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泰国作为“中等国家”要发挥积极作用,进而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4]

印太战略是美日印澳等国共同推动的地缘政治博弈“大棋局”,其目标旨在跨区域重塑地缘战略格局,因此对泰国而言,无论是“小国”抑或“中等国家”,都无力在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觊觎主导者的棋手位置,唯有成为审时度势以求在地缘政治变局中趋利避害的“无奈受众”。不过,相对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长期以来积攒的地缘政治筹码,还是有助于泰国避免陷入完全被动的“小国”棋子困境,有可能作为印太战略必要但非关键的次区域支点,保留相当程度的“中等国家”能动性,甚至跻身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次级合作者。具体来看,泰国在印太战略中的立足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地理位置来看,泰国将成为印太战略的必要环节

尽管当前域内外大国(中等强国)都在讨论印太战略,但相关国家对“印太”地区的概念界定却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对“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是否涵盖在内,各国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美澳等国主张的是“印度+太平洋”的概念界定。根据美国国防部2019年《印太战略报告》的概念界定,印太地区是指“从美国西海岸到印度西海岸”,并未包括“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5]对美国而言,中东地区是其全球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如果在地缘政治上与印太发生联动,就有可能引发不确定性风险,甚至改变中东地区的既有格局。澳大利亚2017年《外交白皮书》的概念界定与美国相近,印太地区是指“通过东南亚连接的印度洋东部到太平洋地区,包括印度、北亚与美国”。^[6]其中,北亚主要包括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作为中等强国,印太概念涵盖“印度+太平洋”的广袤地区已经是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极限,主客观上既无力也无意将“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纳入其战略视野。

与此相对,日本与印度等国倾向于“印度洋+(西)太平洋”的概念界定。对日印两国而言,“印度洋西部到中东及非洲东海岸”在国家战略中占据重要地位,不仅是石油与天然气等战略物资的主要来源地,而且是拓展海外市场的关键目的地。201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时,正式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设想,明确表示“日本有责任促进太平洋和印度洋以及亚洲与非洲交往,使之成为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不受武力侵扰或威慑的富饶之地”。^[7]2018年6月,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十七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对“印太构想”进行全面阐释时,明确指出印太地区是“从非洲海岸到美洲海岸”的“自然区域”。^[8]

从地理位置来看,泰国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的两洋交汇之地,东南紧临太平洋海域最西端的暹罗湾,西南直面印度洋海域东部的安达曼海。历史上,泰国南部的克拉地峡曾是连通两洋贸易的重要陆路商道。^[9]尽管随着海上贸易发展,两洋贸易的枢纽早已转移至马六甲海峡,但泰国兼顾两洋的地理位置并未改变。这使得无论印太战略的范畴是“印度+太平洋”抑或“印度洋+(西)太平洋”,泰国都处在地缘政治博弈的战略要冲,使得泰国无可避免地将会成为印太战略的必要环节。

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对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必不可少”。^[10]对此,泰国有所预判并做出了应对。巴育政府在上文提及的《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二部分“外交事务”中强调指出,未来20年大国力量在本地区的战略博弈很可能进一步加剧,将会对泰国产生日益显著的“站队”压力,必须采取有效举措

保持外交平衡战略。^[11]事实上,这也正是泰国在201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努力开展外交斡旋,协同印尼推动东盟国家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出台《东盟印太展望》的重要原因。

(二) 从陆海分野来看,泰国并不是印太战略的关键要冲

尽管在当前的印太战略影响下,泰国很难置身事外,但与冷战时期作为美国盟友坚守“反共”前沿,从而在越南战争及越南侵略柬埔寨事件中承受地缘政治重压的被动局面相比,却是有显著差异。从地缘政治博弈的侧重点来看,当前的印太战略更多聚焦于海权而不是陆权,海洋权益与海上安全成为各大国(中等强国)的角力关键。^[12]从现阶段来看,印太战略在东南亚地区引发的首要风险是在南海与马六甲。这就为泰国从容规避地缘政治博弈的风口浪尖,提供了有利条件。

泰国在地理上兼顾两洋,但在地缘政治上长期以来都是以陆权为主的半岛国家,海上力量较为薄弱,更多是近海巡逻与防御。泰国海军大约6.6万人,仅为陆军的1/3左右。事实上,从1951年海军支持左翼运动发动“曼哈顿”政变被陆军镇压,甚至旗舰都被炸沉后,海军在军人集团内部就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缺乏话语权。^[13]20世纪后期,泰国曾提出打造“蓝水海军”的战略规划,试图将海上力量投射到远洋地区,并为此购置了东南亚迄今为止唯一的航空母舰“差克里·纳吕贝特”号,但在1997年航母交付之时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从而使财政困顿的泰国被迫放缓了海上力量的现代化进程。“差克里·纳吕贝特”号航母也因为缺乏舰载机而失去军事威慑力,更多的是承担非传统安全的抢险救灾职能。

从当前美日印澳等国推动印太战略的举措来看,海权博弈的拉拢对象更多聚焦于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海主权声索国,泰国处于相对次要地位。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强调,除了既有军事盟友,也要“进一步增强与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伙伴国的安全合作”。^[1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在《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印太战略:国会需要解决的问题》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印尼与越南,却很少论及泰国。^[15]美国兰德公司的《日益深厚的亚洲安全合作网络:在印太地区深化美国盟友及合作伙伴的防务关系》报告更是坦言,泰国“确有其地缘意义,但在印太战略视角下缺乏活力与网络合作”,结果成为报告中唯一未被专章讨论的美国亚洲盟友。^[16]

由于在地理上与南海和马六甲都保持着安全距离,因此,除非泰国重提开凿克拉地峡修建运河以贯通两洋的百年战略构想,从而主动卷入海上航道的战略要冲博弈,否则在当前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中,更多的将会是协作方,而不是直面冲突的当事方。于是,巴育政府在2019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中,一方面强调指出,本地区存在大国博弈引发冲突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却对地区冲突可能导致的泰国安全风险表现淡然,相关应对政策与计划的优先度排序,不仅赶不上保持国内政局稳定与平息南疆分离运动,甚至还要落后于环境、能源、食品等社会安全问题。^[17]

(三) 从功能定位来看,泰国着眼于发挥次区域支点作用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拥有强烈的外交自信,并且坚持在本地区战略格局调整过程中主动应对,力求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这也是泰国从二战到冷战再到后冷战时期,始终能在大国博弈的罅隙间求生存并取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对泰国而言,此次在印太战略影响下的跨区域地缘战略格局调整,既是改变现有发展环境的重要不确定性外部冲击,也是提升国际地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契机。为此,巴育政府强调指出,针对国际与地区新形势,外交工作要遵循“5S”原则,通过举国协同(Synergy),整合政府各部门力量,并推动私营部门与学界共同参与,完善国际规则(Standard),提升国际影响力(Status),切实保证泰国安定(Security)与可持续发展(Sustainability)。^[18]

尽管泰国很难超越“中等国家”的综合国力限制,但其七千多万的人口规模、东南亚第二的经济总量、中南半岛唯一的中等收入国家、美国的非北约主要盟国、印度“东进”政策的重要对接方、日本在东南亚的首要投资目的地,以及首都曼谷作为国际交通枢纽与国际组织聚集地等,还是为其提供了充足“筹码”,从而有助于发挥次区域支点的重要作用。对此,泰国现任政府颇为自信。巴育上将在2019

年“还政于民”举行大选并连任总理后的国会施政报告中提出,泰国将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并成为东盟维护地区安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19]

二、多元化背景下泰国对印太战略的利弊认知

印太战略的产生发端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动的客观影响。对此,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中指出,之所以要将“印太”作为单一的地缘战略概念,主要基于3方面原因:一是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持续崛起,二是东亚地区在全球经济与战略中的权重增加,三是印度将随着时间推移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发展趋势,以及受此影响,印度洋正成为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加的区域。^[20]与此相似,日本从2013年出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到5年后修订的《防卫计划大纲》,都在反复强调中印等新兴大国强势崛起对原有国际与地区格局的深刻改变,以及国际政治经济重心向太平洋及印度洋的持续转移。^[21]

不过,尽管面对相同的地缘变局,但是域内外各大国(中等强国)的主观认知各不相同,因此在确定各自印太战略过程中,难免会在战略目标、布局、手段与方案等各方面产生分歧甚至矛盾,并在贯彻落实过程中相互掣肘。对于“中等国家”泰国而言,各大国(中等强国)在印太战略中的非一致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背景,使其有可能在大国博弈的罅隙间趋利避害,甚至化危为机。

具体来看,泰国对当前“印太战略”发展趋势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 印太战略的根源是地区秩序重塑,将会增加泰国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

尽管从布局来看,美日印澳等国的印太战略都涉及诸多领域,呈现全方位多层次的战略诉求,但就其本质而言,皆根源在于中国崛起背景下对原有地区秩序改变的不确定性担忧。由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变动的大趋势难以逆转,因此各大国(中等强国)都试图在地区秩序重塑过程中抢占更有利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合作制衡与约束中国的战略共识。

作为原有国际与地区秩序的领导者,美国对自身影响力下降的感受最深刻,其反应也最强烈,因此在对华遏制方面表现得最积极最强硬。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与“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中国试图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拓展其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适用范围,并以有利中国的方式重构地区秩序。”^[22]2018年美国国防部发布《国防战略报告》指出“中国正在借助军事现代化、影响力操控、以及掠夺式经济胁迫邻国重构于其有利的印太秩序。随着经济与军事实力持续攀升,中国正在通过举国体制推行长期战略主张权力,并将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从而在近期寻求印太地区霸权,并在未来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导权。”^[23]2019年美国《印太战略报告》在讨论“印太战略”格局面临的挑战时,将“修正主义国家”中国列为四大挑战首位,指责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强制性行动”,以及“利用经济手段谋求战略利益”,从而将影响甚至取代美国在印太及全球的主导权。^[24]

日本与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传统盟友,都是美国主导下的原有国际与地区秩序受益者。^[25]对此,澳大利亚在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指出,澳大利亚是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重要受益者,支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高度符合澳大利亚的根本利益,因此,澳大利亚要“继续坚定地支持美国的国际领导”,并与具有相似观念的国家合作。^[26]不过,作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更多体现为“保底”立场,避免在地区秩序重塑的进程中被边缘化,因为不是觊觎领导地位,再加上对华经贸合作对其而言意义重大,因此在推进印太战略的过程中,特别在对华政策方面是否紧随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时,经常表现得摇摆不定,甚至会在政策言论与行动之间存在明显差距。^[27]

相比之下,日本的印太战略在首相安倍晋三主导下,表现出明确且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与行动策略。尽管安倍晋三在2017年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后,又于2018年将表述调整为“印太构想”,但这不

过是日本在中美两国竞争日趋激烈时所采取的战术调整,并未改变其核心意图。^[28]对日本而言,印太战略一方面是要在美日同盟框架下,重塑美国的地区秩序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则要在地区秩序的重塑过程中,使其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同盟体系下衍生的“印太”次级准同盟体系的“二把手”,提升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话语权,从而为战略自主打好基础。^[29]因此,日本的印太战略具有应对中国崛起的“特定指向性”,以防范在美国影响力衰退过程中,中国趁势填补地区权力真空甚至主导“印太秩序”重塑进程,从而呈现明显的战略竞争色彩。^[30]

印度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并不认同美国主导下的印太秩序,而是试图在地区秩序重塑过程中,借势拓展战略利益和影响力。对此,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香格里拉峰会上强调,“印度并未将印太地区视为一个战略、一个排他性的俱乐部,也不是一个寻求支配权的集团。我们也绝不会认为其针对任何一个国家。”^[31]不过,印度对中国崛起引发的印太地区权力转移,以及中国在印度洋的影响力扩大存在深刻疑虑,因此尽管无意与中国发生对抗或战争,但也不愿看到中国主导地区秩序。^[32]这就使得印度“印太构想”与美国“印太战略”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存在趋同。^[33]

对于印太战略引发的大国博弈风险,泰国有着清醒认知,甚至有知名学者将之直接解读为“新冷战”。^[34]巴育政府在《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2019-2022)》中强调指出,美国当前正面临来自中国的地缘战略挑战,将在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框架下进一步深化安全合作,从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甚至引发冲突与摩擦,使泰国在保持地缘平衡的问题上变得更困难,并会面临更为严峻的不确定性安全风险。^[35]与此同时,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一部分“安全事务”中明确要求,“泰国必须致力于维持与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关系平衡”,应对全球多极化进程中的不稳定性安全风险。^[36]

(二) 印太战略将为跨区域联通与发展提供动力,有助于泰国产业结构升级

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博弈,不仅涉及安全领域,而且涵盖经济领域。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增长区域,印太地区的发展红利与主导权成为域内外大国(中等强国)的重要目标。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序推进,并日益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认可与拥护,从而引起美日等国的质疑与忌惮。于是,印太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竞争的博弈手段,尤其是将其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融资作为主要内容,更是与“一带一路”所倡导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存在明显的同质色彩。^[37]

2017年11月,美国贸易发展署(USTDA)与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签署合作备忘录,旨在为印太地区提供高品质能源基础设施解决方案;同时,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和日本出口与投资保险公司(NEXI)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为印太地区提供高品质的美日基础设施投资替代方案。^[38]

2018年7月,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美国商会主办的“印太商业论坛”上发表演讲,宣布提供1.13亿美元作为“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新时代经济承诺的定金”,以支持印太地区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等一系列项目。具体包括:数字连通和网络安全伙伴关系倡议(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Cybersecurity Partnership),计划从2500万美元初期投资起步,改进伙伴国家的数字连通,扩大美国技术出口;亚洲能源增进发展和增长倡议(Asia Enhancing Development and Growth through Energy),促进安全可持续的印太能源市场;基础设施交易及援助网络(Infrastructure Transaction and Assistance Network),促进符合国际商定原则的印太优质基础设施建设。^[39]

2018年11月,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FAT)以及澳大利亚出口金融与保险公司(EFIC)签署谅解备忘录,旨在落实“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三边伙伴关系”(Tr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the Indo-Pacific),促进印太地区私人投资,推动新的符合公开、透明与财政可持续等国际标准与发展原则的重大基建项目,提升数字连通性与能源基础设施。^[40]

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在第六届美国-东盟峰会上宣布了新的“美国-东盟智慧城市伙伴关系”(U.S.-ASEAN Smart Cities Partnership)建设项目,首期投资为1000万美元,旨在促进东盟国家城市系统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提高美国与东盟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商业参与度。^[41]

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于2018年通过《更好利用投资引导开发法案》(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要求美国通过提供信贷、资本及其他金融支持,在欠发达国家促进以市场为基础的私营部门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根据该法案,美国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国际开发署下属的发展信贷管理局及私人资本与微小企业办公室合并,成立国际开发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从而使美国的国际开发融资规模从290亿美元增至600亿美元,以更好刺激私营部门投资,扩大美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影响力。

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地缘安全层面的对外战略受到限制,因此在地缘经济方面表现得更为积极和主动。早在2016年5月,日本即在伊势志摩七国集团峰会上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投资亚洲的未来”计划。同年1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进一步提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实施细则。2018年日本《外交蓝皮书》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主要举措时,明确要求“通过基于国际标准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来强化连接性,追求经济的繁荣”。^[4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内基建相当落后,但矢志成为“全球大国”的印度在“东进”政策下,同样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话语权表现积极,并与日本形成积极互动。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访日期间,双方在联合声明中提出“亚非增长走廊”计划,旨在通过建立保障工业和运输的基础设施,促进包括非洲在内的印太地区经济发展。^[43]2017年5月,第五十二届非洲发展银行年会在印度召开,莫迪在开幕式致辞中力推“亚非增长走廊”,并重申了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承诺。^[44]2017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印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再次强调联合推动“亚非增长走廊”计划。^[45]

对泰国而言,印太战略在地缘经济层面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引发的大国博弈,虽然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不确定性风险,但至少在当前阶段对中小国家是利好,使其有可能搭乘大国发展的“顺风车”,并在大国博弈下以更优惠条件获得难能可贵的发展资源。巴育政府强调,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联通亚非欧经贸与投资,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则推动印太战略,双方都在争取对中小国家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泰国要平衡与各方关系,并要积极利用地理优势,将国家经济政策与互联互通相结合,从而在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下获得增长动力与发展契机。^[46]

尽管泰国作为曾经的东亚“四小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8年就已超过1000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并在1996年首次超过3000美元,距离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门槛仅半步之遥。不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泰国经济遭受重挫且复苏乏力,直到10年后的2007年才得以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时至今日,泰国面临贫富分化严重、环境污染、能源匮乏、老龄化社会、人才与技术储备不足、基础设施陈旧等结构性难题,难以凭借国内资源促成泰国4.0产业升级。对此,巴育政府明确指出,泰国必须抓住地缘经济格局调整的历史机遇,利用大国博弈的相互竞争态势,把握互联互通与地区产业链重塑的契机,引入外部资源,促进创新产业发展,提升区域交通与物流枢纽地位,使泰国成为“未来20年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中心”,进而克服“中等收入陷阱”难题,达成“充足经济理念下的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发展愿景。^[47]

(三) 印太战略将推进国际规则的制度化建构,有利于泰国维护国家权益

近年来,美国特朗普政府高举“美国优先”旗号在国际事务上相继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中导条约等的“退群”单边行径,不仅引起包括泰国在内的东南亚中小国家疑虑,而且也使得日澳等美国传统盟友深感不安。

事实上,日澳等国积极推动印太战略的形成与发展,相当程度上也是试图对美形成引导性约束,避免美国在单边主义道路上渐行渐远。澳大利亚在2017年《外交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推动和维护国际规则”是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与繁荣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要目标。^[48]而日本在国际规则制度化的建构方面,则有更进一步的战略利益诉求,旨在借此协助美国成为印太地区规则的制定者和管理者。^[49]

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高度重视依托国际规则体系维护和提升本国利益。莫迪在阐释“印太构想”的讲话中多次提及国际法、国际规范、国际规则等,既包括安全领域航行自由,也涵盖经济领域互联互通和贸易多边主义。^[50]2015年印度海军的新版海洋安全战略报告,更是反复强调“国际法和规范”,并特别提及2014年与孟加拉通过仲裁解决海上划界争议。^[51]

对于中小国家而言,尽管长期以来在大国主导下形成的国际规则体系并不完善,依然存在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缺陷与弊端,但国际规则的制度化运作,还是会一定程度上为中小国家提供利益保护,避免其受到霸权国家与强权政治的肆意侵害。巴育政府认为,基于国际法与国际规则的制度化体系是“中等国家”泰国维护国家利益最重要的“防护装甲”。^[52]为此,巴育政府在面对印太战略推进国际规则重塑的情况下,特别强调外交事务中国际规则(Standard)的战略规划:一方面要求国内与国际接轨,敦促国内公私部门遵循国际规则,承担国际义务;另一方面要求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磋商与制定,提升泰国影响力与话语权,进而在国际规则体系重塑过程中争取有利地位。^[53]

三、印太战略下泰国的地缘平衡策略

从殖民时代以来,泰国就一直奉行“大国平衡”的地缘策略,不仅在英法博弈的罅隙间保持了独立,成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而且在美日英中等大国间纵横捭阖,度过了从二战到冷战的困难时期,非但未曾遭受严重的战乱或冲突影响,综合国力还稳步提升,并曾一度成为冷战结束初期的亚洲“四小虎”。于是,面对印太战略引发的跨区域地缘变局,巴育政府理所当然的再次选择了“大国平衡”的传统策略,并试图以“5S”的外交工作原则为指引,发挥地理优势,主动参与地区秩序重塑进程,从而拓展生存空间,为实现“充足经济理念下的安全、繁荣、可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的中长期愿景谋求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为了更直观把握泰国“大国平衡”策略的行为逻辑与现实状况,本文将通过“地缘引力结构”示意图加以分析。如图1所示,在印太战略影响下,泰国(中心位置的最小黑色圆点)当前主要面临中美日印的地缘引力(黑色箭头)影响,并在此基础上依托东盟(中心位置的灰色区域)形成动态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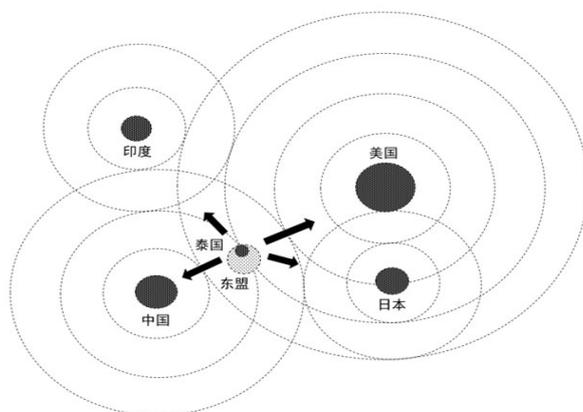


图1 印太战略下泰国的“地缘引力结构”示意图

所谓“地缘引力”是指大国(或中等强国)在地缘战略博弈中,通过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方式与中小国家形成互动,从而持续影响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牵引状态。对此,有必要从以下方面予以理解:

首先,地缘引力的强度主要取决于双方体量。如果作为施力方的大国(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越强,那么在地缘关系中拥有的体量也就越大,所产生的地缘引力也就越强。不过,由于地缘引力是建立在互动基础之上,因此作为受力方的中小国家体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地缘引力的强度上限。

其次,地缘引力存在拉近双方距离的自我强化作用。如图1所示,虚线同心圆代表的是施力方的地缘影响力辐射范围,其影响力从中心到外围逐层递减。如果受力方在地理位置、经济命脉、安全保障、文化传统等方面越靠近施力方,那么所受到的地缘引力作用也就越明显。事实是,如果受力方并未受到反方向的其他地缘引力影响,那么在施力方的地缘引力作用下就会沿着虚线同心圆从外围向中心靠拢,并在持续增强的地缘引力作用下形成对施力方的战略依附。

再次,地缘引力具有结构性的持续效果。地缘引力是施力方与受力方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互动的结构性体现,其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双方互动过程中的最优环节,而是会受到其他环节,尤其是薄弱环节的“短板效应”影响。因此,对施力方而言,增强地缘引力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难以一蹴而就。

从“地缘引力结构”的角度来看,泰国在应对印太战略的地缘政治变局中,采取的是“以中美为主轴,保持地缘平衡;以日印为两翼,分散大国引力;以东盟为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的策略选择。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保持中泰与美泰的地缘平衡

美泰两国于1818年建交,并于1833年签订《友好通商条约》,从而开始正式往来。^[54]2018年,泰美举行了盛大的建交200周年庆典。相较于中泰关系可以上溯到汉代的2000多年交往历史,美泰关系并不算悠久。不过,19世纪美泰关系发端之际,却是中泰关系由盛转衰的变乱之时。从1852年泰国(时称暹罗)停止“朝贡”到1975年中泰建交的120多年间,中泰关系持续走低,甚至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55]与此相对,美泰关系则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二战结束后,曾是日本“盟国”的泰国在美国支持下成功摆脱“战败国”的不利地位,从而有效抵制了英国借严惩泰国之机重返中南半岛的战略意图,并为美泰两国在冷战时期的战略合作铺平道路。

冷战期间,泰国面临来自美国的地缘引力持续增加。在政治领域,泰国在美国引导下,形成了明确的“反共”官方意识形态,并成为中南半岛的冷战前沿阵地。在安全领域,作为前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员国,美泰两国于1954年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亦称《马尼拉条约》),从而成为军事盟国。尽管东南亚条约组织于1977年解散,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美泰两国依然有效,并与1962年泰国外长塔纳特·科曼(Thanat Khorman)与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签订的《塔纳特-腊斯克公报》共同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对泰国的安全承诺基础。在经济领域,美国为泰国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投资,其中仅1946年至1966年间,就有约10亿美元用于经济和军事援助。^[56]在文化领域,美国开展了有针对性的援助项目。据统计,到1987年,泰国已有超过1.1万名学者和公务员赴美接受深造。^[57]

不过,随着越南战争结束,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首轮变化。一方面,美国于1976年从泰国撤军,迫使泰国直面中南半岛的越南地缘压力,从而严重影响了泰国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另一方面,中泰建交后双边关系回暖,尤其是在应对越南侵柬事件过程中的相互配合,有力提升了两国政治互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泰国爆发,促使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第二轮变化。美国方面的袖手旁观甚至落井下石,放任西方公司低价掠夺性收购泰国优质资产,引起了泰国社会各界

普遍不满;与此相对,中国方面承受重压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道义担当,以及“中泰一家亲”共克时艰推动经济复苏的历史记忆,成为中泰关系步入“快行道”的重要助力。

21世纪以来,中泰之间地缘引力持续走强。泰国在东盟国家中最先与中国签署《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最先与中国落实蔬果零关税的早期收获计划,最先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最先与中国建立防务安全磋商机制并开展联演联训。与此相对,美泰关系却由于美国对泰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持续走低,从而导致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强弱走势出现第三轮变化。对此,有泰国学者不无酸楚地形容到,“今天暹罗小姐(泰国)已经做好准备,离开‘山姆大叔’(美国)投身北京‘阿哥’(中国)的怀抱”。^[58]

目前,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正处于强弱转换的拉锯阶段。总体而言,尽管中泰关系进一步加强,而美泰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59]但是,美泰之间的地缘引力存量特别是在安全领域的优势明显,使得中泰之间要依托增量优势改变地缘引力的既有关系格局,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具体来看,美泰与中泰的地缘引力变化,以及泰国的地缘策略选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政治领域。冷战期间作为美泰共识基础的“反共”理念不复存在,当前更多的是泰国政治权力核心的“铁三角”军人集团、王室-保皇派、曼谷政商财阀奉行“泰式民主”^[60]与美国主张“西式民主”之间的结构性分歧。

美国在2014年巴育政变上台后,采取了强硬的抵制立场,不仅暂停了国际军事教育与培训(IMT)和外国军事融资(FMF)项目下的数百万美元援助,而且大幅减少了双边高层互访。2015年初,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l)访泰期间,甚至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中公开批评巴育政府。^[61]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民主人权方面的意识形态立场有所缓和。从2017年开始,美国高级官员接连访泰,重申双边关系重要性,并讨论正常化进程。同年10月,泰国总理巴育应邀访美,从而为美泰关系有序回暖铺平道路。

不过,由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下并未放弃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输出,美泰政治互信的裂痕很难彻底弥合。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要继续做“全世界自由和机会灯塔”。^[62]2018年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更是明确授权自2019年至2023年每年拨款2.1亿美元,促进印太地区的民主、公民社会、人权、法治、透明度等。^[63]2018年11月,美国政府出台了“印太透明度倡议”,旨在推动印太地区的公民社会、法治以及透明、公正和负责任治理。为此,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将援助工作重点集中在“促进选举过程的可信度”“支持媒体的独立和信息的可信性”“保护人权,包括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支持问责和透明,包括反腐败,加强法治”及“加强公民社会”等方面。^[64]

于是,随着2019年巴育上将在“还政于民”后举行的大选中连任总理,开启“泰式民主”的新阶段,泰美双方在政治领域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摩擦再次浮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力量支持反政府的“塔纳通派系”,质疑泰国民主选举的合法性与公正性,不仅在塔纳通·宗龙伦吉接受司法审查时,通过外交人员在法院外声援的方式公开政治“站台”,而且在塔纳通领导的未来前进党被宪法法院强制解散后,仍通过国际舆论公开质疑泰国司法公正,从而引起巴育政府强烈不满。

与此相对,中国政府坚持“互不干涉内政”原则,始终相信泰国人民有能力也有智慧解决政治分歧。近年来,中泰两国高层互访不断,有力提升了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尽管中泰两国的政体与国体有所差异,但并未成为影响政治领域双边关系发展阻碍,而且为相互借鉴与学习彼此的执政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并有可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形成更广泛的观念共识。对此,美国亚洲基金会在报告中深感担忧,认为“泰国政策制定者正在受到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影响和吸引”,从而在价值观与意识形态上日益远离美国的传统影响。^[65]

(2)安全领域。近年来,中泰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不仅军方高层往来密切,而且务实合作有序落实,特别是联演联训、装备技术、多边安全等方面交流合作成效显著。2015年,中泰举

行代号“猎鹰打击”的首次空军联合演习,从而成为两国继 2007 年首次陆军联合演习(代号“打击”)与 2010 年首次海军联合演习(代号“蓝色打击”)之后的又一重要进展。与此同时,中泰两国在军购方面也是成果斐然。泰国军方不仅采购了价值 2.3 亿美元的 50 辆 VT-4 主战坦克,价值 10 亿美元的 3 艘 S-26T 常规潜艇,以及 VN1 轮式装甲车、071E 型船坞登陆舰、CX-1 反舰超音速巡航导弹、CM-708UNB 海鹰潜射反舰导弹等各类武器装备,而且在梭桃邑军港建立潜艇基地,以及在东北地区建立武器组装与维修基地,以构建中式装备的后勤保障系统。^[66]

不过,相较于中国在对泰安全合作方面取得的增量进展,美泰安全合作即使受到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但在存量方面的既有优势依然显著。

首先是组织优势。美泰两国目前每年要举行包括“金色眼镜蛇”在内的 60 多次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其深度广度精度都不是中泰合作所能比肩。如此规模的防务合作得以有序开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的美国驻泰机构提供协调与配合,尤其是美泰联合军事顾问小组(JUSMAGTHAI)的重要作用。该机构成立于 1953 年,主要负责沟通、协调和落实美泰联合军演、国际军事教育和培训、外国军事融资、人道主义排雷以及军事医疗交流等项目合作。该机构的办公场所并不在美国大使馆,而是位于泰国皇家武装部队设施内,其负责人还兼任泰国国防部高级官员。^[67]作为冷战遗产,此类机构在很大程度上早已嵌入泰国军方运作的组织网络,并在其中长期发挥着信息辨识、人员筛选、资金输送、利益协调等重要作用,从而保证了美泰安全合作的脉络畅通。

其次是体系优势。美泰安全合作经过冷战时期的长期磨合,已呈现体系化特征。泰国防务从军事理论,到武器装备,再到实操条例,都具有深刻的美式烙印。为此,美国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持续培训泰国军官。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每年培训的泰国军官多达 1500 名以上,冷战后期的培训规模有所下降,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依然保持在每年 350 名左右。^[68]21 世纪初,曾接受过美国培训的泰国军官累计已多达 2.1 万名。^[69]泰美安全合作体系化,一方面使泰国契合了美国在《印太战略报告》中对盟友提出的“互操作性”要求,另一方面也使泰国在安全合作中难以调整方向。即使采购了中式装备,但要做到无缝接入现有防务体系,泰国军方将面临诸多“兼容性”的现实难题,需要相当长时期的磨合与调试,从而客观上限制了中泰安全合作的发展步伐。^[70]

再次是沟通优势。泰国军官的第二语言基本都是英语,而不是汉语。尽管近年来汉语学习人数增加,但在泰军中的适用范围依然相当有限。事实上,即使是来华参加汉语培训的军事人员,归国后也很难有效运用并保持其语言能力。尽管对军方高层交往而言,语言沟通不是问题,但在更广泛交流与合作过程中,特别是联合军演中,语言沟通不畅的限制性就会表现得相当明显,严重限制“互操作性”的有效提升。^[71]

针对中美两国在印太战略下的地缘安全博弈,泰国在安全领域试图采取有引导的对冲策略,既要积极获取与中国安全合作的增量红利,又要努力保持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存量收益,并在此基础上,引导两国将竞争转向泰国最关心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形成更有利于泰国的次区域安全态势。

为此,泰国在巴育总理访美后,随即订购了美国价值 8 千万美元的 4 架黑鹰直升机与 60 辆翻新 M1126“斯特瑞克”装甲输送车,以及价值 4 亿美元的 8 架“小鸟”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和 50 架“地狱火”导弹和先进制导火箭。^[72]

2019 年 11 月 17 日,美泰两国在时隔 7 年后更新了《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从而为印太战略推进过程中的双边安全合作提供了原则指引,并开宗明义的指出防务合作旨在保证“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稳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以维护具有包容性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73]但是就在同一天,泰国也与中国签署了《国防部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并表示希望以 2020 年两国建交 45 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军继续加强联演联训、装备技术、多边安全等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两军关系迈上新台阶。”^[74]

(3)经济领域。有关美泰与中泰之间地缘引力的强弱判断,“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是流传甚广的形势描述。相较于迄今为止美泰在安全领域依然难以动摇的存量优势,中泰在经济领域持续性的增量红利,已经积聚并转化为足以与美泰分庭抗礼甚至更胜一筹的存量底蕴。

如表 1 所示,从贸易来看,虽然 2019 年泰国对华出口与对美出口相比还略有差距,但在双边贸易总额方面,中泰贸易总额已经远远超过美泰贸易总额,并稳居除东盟外的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从投资来看,虽然美国在 2019 年外国直接投资头寸中的占比略高于中国,但在年度批准总额方面,中国对泰投资呈现显著优势。事实是,相较于 2013 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中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已经翻了一番,而同期美国对泰直接投资头寸仅增长了 21.4%,年均增幅不足 4 个百分点。从消费来看,2019 年中国游客的人数甚至超过东盟,相较于美国更是超过 4 倍,从而稳居泰国第一大海外旅客来源国。

表 1 2019 年泰国与主要国家(地区)经贸往来情况

国家(地区)	中国	美国	日本	印度	东盟
双边贸易总额(亿美元)	795.00	486.50	577.80	121.54	1,079.28
泰国出口额(亿美元)	291.72	313.43	245.58	73.33	629.04
外国直接投资头寸(亿美元)	71.23	187.14	934.18	5.65	476.09
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批准总额(亿泰铢)	738.10	145.78	880.67	7.26	299.85
海外旅客人数(万人次)	1,099.5	180.6	116.8	199.6	1062.7
双边贸易总额占比(%)	16.46	10.07	11.97	2.52	22.35
泰国出口额占比(%)	11.85	12.73	9.87	2.98	25.55
外国直接投资头寸占比(%)	2.65	6.96	34.75	0.21	17.71
外国直接投资年度批准总额占比(%)	26.18	5.17	31.24	0.26	10.64
海外旅客人数占比(%)	27.62	4.53	2.93	5.02	26.70

数据来源:泰国(中央)银行网站, <https://www.bot.or.th/English/Statistics/Pages/default.aspx>。

泰国在经济领域基本奉行市场经济原则,虽然在政策层面遵从“充足经济”理念的指导原则,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贸易与投资壁垒,但总体而言较少对中泰与美泰的经济合作产生影响。面对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战略博弈,泰国在经济领域将表现得更为积极进取。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在基建方面,巴育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寄予厚望,但同时也支持美日印澳在印太战略下的基础设施建设倡议。虽然对美日等西方国家“口惠而实不至”做法司空见惯,但泰国还是试图借印太战略“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东风,在对华合作中获取更有利的谈判态势与优惠条件。

其次是在贸易方面,泰国正通过电商渠道努力搭乘中国开放内需市场的“顺风车”,旨在为泰国特产品打开销路,从而提升政府扶贫开发的效果与能力。与此同时,巴育政府也在以印太战略的协同配合为对价,争取推进美泰自由贸易协定,从而获得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再次是在投资方面,泰国正努力成为国际与地区产业链重构以及中美经贸“脱钩”的获益者,以承接更多产业转移。不过,泰国对低端产业设置了较高门槛,以避免进一步恶化国内劳工短缺与环境污染问题,但在人才与技术储备方面的结构性短板,使得泰国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市场化吸引力有限。因此,巴育政府试图借印太战略的地缘博弈态势,提升国家政策层面的产业承接能力。

为此,巴育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泰国 4.0 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提出了东部经济走廊(EEC)与粤港澳大湾区成立合作机制的发展诉求;^[75]另一方面以对华合作为筹码,推动对美合作并取得初步成效。2020 年 3 月,美国驻泰大使迈克尔·德松布莱(Michael George DeSombre)到任。作为近半个世纪以来首位政治任命的驻泰大使,德松布莱曾长期在亚洲从事美国及西方公司投资法律服务,他在履新时明确表示,将更多关注美泰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与数字经济领域,以协助美国及西方公司对泰投资。^[76]

(4)文化领域。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对泰国的影响存在一定的非对称性,各自在不同方面表现出相对优势。一方面,得益于源远流长的中泰交流与合作,中国文化在泰国具有相当深刻的历史烙印,尤其是大量融入泰国本土的华人移民,使中国文化嵌入了泰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

另一方面,冷战期间密切的美泰关系,使泰国在传统农业国家转型成为新兴工业国家进程中,特别是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深受美国影响,从而使泰国现代文化尤其是城市文化弥漫着鲜明的美国色彩。对此,美国亚洲基金会在有关“美泰关系”的调研报告中,颇为自信的表示,泰国年轻人依然被美国“生活方式”所吸引,标志着最初在越南战争时期建立的“软实力”得以有效延续和演化发展,其中“包括好莱坞电影,美国音乐表演,星巴克咖啡和咖啡馆文化,谷歌、脸书和社交媒体,苹果产品和技术创新趋势,以及耐克和其他公司的健身时尚等”。^[77]

不过,调研报告也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来中国在泰国持续提升文化影响力,从而使美国在争取泰国新生代精英阶层的博弈中渐落下风,有可能在中长期失去当前的文化优势。21 世纪以来,泰国赴美留学生人数从 2000 年的近 1.2 万,大幅降至 2017 年的不足 7 千,而在中国留学的泰国学生人数则超过 2.7 万,此外还有 3.7 万中国学生在泰国留学,以及多达 1700 多名汉语教师与志愿者在泰国工作。^[78]

泰国政府原则上尊重多元文化,泰国社会传统上相对开放包容,即使是较为小众的亚文化在泰国也能获得颇为宽松的发展空间。不过,作为东南亚唯一的非殖民地国家,泰国在坚持本土文化主体性方面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立场。任何可能影响传统泰族文化内核的外来文化,都会引起保守力量特别是王室-保皇派与军人集团的质疑甚至不满。拉玛十世哇集拉隆功国王继位以来,泰国保守力量在复兴“国王-宗教-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力度明显提升。

对泰国而言,文化领域的地缘引力存在“天花板”,难以发挥关键性的牵引作用,更多是为政治、安全及经济领域的地缘引力提供辅助,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与摩擦。事实上,如果从提升地缘引力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当前中泰与美泰在文化领域都已形成有效支撑,但要在印太战略的地缘博弈下发挥更大作用则相当困难,甚至会遭遇源自泰国保守力量的不确定性风险。

(二)增强日泰与印泰的地缘关系

对于“中等国家”泰国而言,无论是中泰关系,还是美泰关系,其紧密抑或疏远的尺度把握主动权都不在泰国一方,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立场。这就使得在图 1 中,泰国要在单一维度上有效平衡中泰与美泰之间的地缘引力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达成的策略目标。近年来,美国为巩固在安全领域的存量优势,持续谋求“重返乌塔堡空军基地”,^[79]以形成覆盖中南半岛甚至中国西南的战略威慑;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领域持续加大合作力度的做法也引起争议,甚至成为政治反对派攻讦巴育政府“在经济上过度依附中国”的不信任案议题。^[80]于是,在图 1 中,依托多元维度的地缘引力,以合力方式约束“中泰-美泰”在单一维度上的地缘引力失衡,从而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稳定,也就成为当前泰国在印太地缘博弈下的必然选择。

不过,虽然多元维度的地缘引力普遍存在,但要在印太战略下对“中泰-美泰”产生实质性影响却不易。例如,澳大利亚虽是印太战略“四边对话”支点国家,但其“中等强国”的综合国力有限,并且在地理上也远离泰国,地缘引力相对有限。更关键的是,澳大利亚对印太国家的重要性排序是美国、中

国、日本、印尼、印度和韩国,之后才提到东盟,泰国甚至都不在其战略视野之内。^[81]与此相仿,英法等国的印太战略重心也都与泰国关联度不高,因此很难成为泰国塑造地缘引力平衡的有效助力。^[82]

如图 1 所示,泰国在印太战略下,主要是依托日泰与印泰关系为两翼,保持地缘引力结构的动态平衡。^[83]泰国的地缘策略选择,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以下主客观因素:

其一,日本与印度都有各自“大国”诉求,有助于形成区别“中泰-美泰”的多元维度。多元维度最为关键的是要在受力方周边存在分散的施力方,从而形成多角度的地缘引力。日本与印度在国家战略层面都具有坚定且持久的“大国”诉求,并将目标锁定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印度始终强调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而日本也从未放弃成为“正常国家”。在印太战略下,日本追随美国,但根本意图是要在印太秩序的重塑过程中成为“二把手”,因此其对泰国的地缘引力与美国存在一定偏移;印度则从未打算屈居美国之下,始终坚持要在印太地区成为单独一极,因此其对泰国的地缘引力很大程度上将区别于中国与美国。这使得泰国有可能在“中泰-美泰”的主轴之外,引导形成日泰与印泰的稳定两翼(见图 1)。

其二,日本与印度都与泰国存在高强度的地缘引力,足以对“中泰-美泰”形成战略牵制。在地理位置上,日本与印度都地处亚洲,分别位于泰国的东西两侧,尽管日本是在东亚-太平洋区域,而印度是在南亚-印度洋区域,都与东南亚的泰国分处不同区域,但却是泰国周边除了中国之外最符合近邻范畴的“大国力量”,拥有影响地缘政治格局的综合国力。

从双边关系来看,印度与泰国有着长达 2000 多年的悠久交往历史,周边国家中唯有中国可以比肩。印度文化全面渗透到泰国社会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从而为相互理解与认知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泰国在“西望”(Look West)政策下有效对接印度“东向”政策,从而成为印度进入东南亚的重要枢纽与门户。^[84]莫迪政府将“东向”政策提升为“东进”政策后,泰国的对接作用进一步增强。印泰两国共同参与推动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等多边机制,已成为连接南亚(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的重要合作平台,正在发挥日益显著的沟通与协调作用。^[85]

日本与泰国交往起步较晚,但也可以上溯到 16 世纪的大城王朝时代。二战时期的日泰军事同盟关系,以及冷战时代同为美国盟友的阵营关系,都为日泰各领域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86]长期以来,日本一直都是泰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无论是在贸易方面,还是投资方面,日本都在泰国拥有显著存量优势(见表 1)。曼谷街头随处可见的日本车、日餐厅、日文标牌等,更直观展示着日本对泰国的广泛影响力。

其三,日本与印度在政治领域的包容立场,有助于缓和泰国在印太战略下的价值观压力。印太战略在美国主导下,具有相当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取向。对此,日本表现得较为中庸。一方面表态支持美国立场。2013 年日本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指出,“维护以尊重自由、民主和基本人权及法治等普遍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日本的国家利益所在”。^[87]2017 年,首相安倍晋三在提出“印太战略”后的首次施政演讲中,明确表示要在落实印太战略过程中“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88]但另一方面在落实过程中相对温和,特别是在对泰关系中表现明显“包容”,并未因泰国保守派政变夺权且奉行“泰式民主”而影响与巴育政府的交流与合作。^[89]与此相比,印度总理莫迪的表态更为直接,明确主张要在印太战略下倡导“包容”立场。^[90]2014 年泰国发生政变后,印泰双边关系不仅未受到任何影响,高层互访如期举行,而且各领域交流与合作还进一步深化拓展。^[91]

从日泰与印泰的双边关系发展来看,尽管总体上都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积极推进,但就成效而言,还是有所侧重。其中,印泰关系更侧重于安全领域。事实上,尽管近年来印泰之间经贸合作呈高增长态势,但无论增量还是存量都相对有限(见表 1),并且印度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面临诸多的结

构性难题,因此其市场潜力与人口红利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很难有效转化为泰国经济增长动力。例如,早在2003年就开工的印缅泰国际高速公路建设项目,^[92]时至今日也未能全线贯通。与此相比,印泰两国在安全领域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方面成效要更为显著。双方早在2012年就签署了《防务合作谅解备忘录》,近年来更是在平叛与反恐行动、海上联合巡逻、抢险救灾、联演联训等方面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合作,从而为促进南亚(印度洋)-东南亚(太平洋)的跨区域安全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93]

日泰关系则更侧重于经济领域。近年来,日本在东南亚海上安全能力建设方面动作频仍,甚至尝试向泰国推销P-1反潜机和US-2水陆两用飞机,^[94]以及FPS-3地面防空雷达,^[95]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泰安全合作。^[96]不过,由于受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职能限制,再加上日本地缘博弈更多聚焦于南海主权声索国,因此泰国在对日安全合作方面积极性不高。但在经济领域,泰国呈现出强烈的对日合作意愿。这主要表现在3方面:一是利用日本降低对华经贸依赖度的产业链调整契机,吸引更多日资企业从中国转移到泰国。^[97]二是借助印太战略下中日协调的有利态势,努力争取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在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项目落地。^[98]三是在日本的“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以及日印合作的“亚非增长走廊”框架下,加紧推进中南半岛的东西经济走廊与南部经济走廊建设。^[99]

其中,东西经济走廊是从越南岘港出发,由东向西经过越南、老挝、泰国、缅甸4国,最终到达缅甸毛淡棉港并隔海连通仰光;而南部经济走廊则是从越南胡志明市出发,由东南向西北经过越南、柬埔寨、泰国、缅甸四国,途经金边、曼谷等大城市群,最终到达缅甸土瓦港。^[100]如果两条经济走廊都能建成并发挥预期作用,将会使泰国成为连通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陆海大通道枢纽,从而为其成为“未来20年亚洲的贸易和投资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三) 依托东盟提升地缘风险应对能力

地缘引力结构的稳定性,相当程度上与受力方的体量相关。相同强度的地缘引力作用下,受力方体量越大,施力方牵引效果就越弱,受力方也越有可能保持稳定,反之亦然。如图1所示,作为“中等国家”,泰国在地缘引力结构中的体量有限,因此很容易受到施力方的地缘引力影响,即使通过多元维度相互牵制,最终达成动态平衡,从而避免在单一维度上过度偏向任何一方,但在调适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地缘格局变化的不确定性影响。

于是,对泰国而言,依托东盟提升体量,从而由图1中的最小黑色圆点拓展为灰色区域,也就成为其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格局变动中有效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策略。为此,巴育政府不仅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反复强调东盟重要性,而且还在2019年施政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强东盟工作的具体目标与方案。^[101]总体来看,泰国在印太战略中的东盟策略,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努力提升东盟凝聚力与竞争力。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进程中曾创造过“奇迹”。东盟对内坚持“东盟方式”,在维护成员国主体地位和坚守不干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协商合作凝聚共识,使得战乱贫困的东南亚地区走向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外以“东盟为中心”,努力摆脱对外部大国的依附,在大国的竞争中寻求发展,甚至通过“小球推动大球”引导地区合作发展。但是,“东盟方式”也使得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阻碍,难以取得预期成效。

随着印太战略下的地区秩序重塑压力上升,东盟作为“中小国家的松散联盟”将很难为泰国提供有效的风险防范助力。于是,为提升东盟的凝聚力与竞争力,泰国在2019年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通过与印尼默契配合,促成了东盟国家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东盟印太展望》,从而有效提升了东盟在印太战略下的话语权与影响力。^[102]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重申了东盟“中心地位”,即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建地区政治与安全架构、处理域内外大国关系、以及地区议程设置和秩序塑造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103]

其二,积极争取在东盟内部的主导地位。尽管是东盟创始国,泰国在东盟发展进程中却相当低调,更多的是扮演“和事佬”的沟通与协商角色。21世纪初,前总理他信·西那瓦执政期间,泰国曾在

外交上表现得积极进取,但随之而来的国内政治动荡,特别是2009年“红衫军”围攻东亚领导人系列峰会会场的严重事件,导致泰国国际形象与地区声望受到沉重打击,使得泰国外交再次回归保守。

近年来,巴育政府在外交上再次表现出较强的进取性。^[104]这一方面是在印太战略下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使得泰国迫切需要更多的外部助力;另一方面也是缓解国内政治压力需要,旨在提升“泰式民主”体制下的政府威望与保守力量话语权。于是,争取东盟主导权,也就成为泰国巴育政府的重要目标。对此,巴育政府在《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中表示,泰国在地理上处于东盟中心,发挥着东盟枢纽的重要作用。^[105]并在2020年《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中明确指出,“本联盟支持泰国在东盟及其他国际安全论坛发挥领导作用”。^[106]

巴育总理在2019年连任组阁时,不仅在派系竞争压力下,留任了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奈,而且在开展东盟工作方面给予全力支持。从成效来看,巴育政府在泰国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积极推动功能性合作,特别是通过《曼谷宣言》促进东盟联合打击海洋垃圾,成立东盟可持续发展研究与对话中心、东盟积极老龄化与创新中心、东盟军事医学中心、东盟灾害紧急后勤系统、东盟-日本网络安全能力建设中心、东盟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培训中心、东盟文化中心等合作机构,以及促成东盟国家联合申办2034年足球世界杯等,切实发挥了引领作用,有助于提升其在东盟内部的话语权与影响力。^[107]

其三,以湄公河流域为支点增强掌控力。泰国地处中南半岛,因此在地缘政治上与南海问题关联甚少,至多是再次扮演“和事佬”的传统角色。从有利角度来看,这有助于泰国在印太战略引发的地缘博弈中规避直接风险。但是,对于试图在地缘秩序重塑过程中成为东盟领导者的巴育政府而言,却是缺失了重要杠杆,难以调动各方资源为其提供战略支持。于是,湄公河流域成为泰国在印太战略下纵横捭阖的首选支点。

事实上,中南半岛的湄公河流域早已成为外部大国的地缘博弈角力场,各类区域合作安排架床叠屋,日本推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GMS)、印度推动的湄公河-恒河合作倡议(MGC)、中国推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LMC)、美国推动的湄公河下游倡议(LMI)等,彼此竞争甚至相互掣肘。^[108]这对泰国而言,既是风险挑战,也是战略机遇。

作为中南半岛的最大经济体与国际交通枢纽,泰国从未放弃对湄公河流域的资源整合。对泰国而言,周边国家不仅是廉价劳动力与能源矿产的来源地,更是重要的潜在市场,事关其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长期发展布局。如果泰国能协调各方关系,促成湄公河流域合作发展的动态平衡,那么,不仅将有助于依托外部大国资源投入推动当地发展,为泰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而且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在中南半岛的地缘影响力,为其与印尼等竞争东盟领导者夯实基础。

为此,巴育政府选择以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简称三河流域机制,ACMECS)为切入口推动合作。2018年,泰国作为三河流域机制的首倡国和时任主席国,提出并促成越老柬缅等参与各方通过了该机制建立15年来的首个5年总体规划(2019-2023)。^[109]随后,泰国开始以此为支点争取大国的认可与支持。2019年,李克强总理访泰期间,双方发表联合新闻声明,表示“泰国欢迎中国成为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首批发展伙伴。双方一致认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同三河流域经济合作战略本质上互补。”^[110]从而标志着巴育政府在协调次区域合作方面,开始迈出坚实步伐。

结语

从中长期来看,泰国虽为“中等国家”,但会成为印度洋-太平洋跨区域融合的重要陆海大通道枢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南半岛地缘格局走势,并有可能在东盟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中国在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时候,有必要将泰国作为次区域支点加以重视,避免泰国当前对中国相对有利的地缘引力平衡发生偏移,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有利环境。

为此,中国对泰工作有必要“防范政治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巩固经济优势,拓展文化纽带”,以形成更稳定且可持续的中泰战略合作关系。具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要在政治领域防范结构性风险。既要警惕政治反对派上台后泰国可能出现“亲西方”的立场转变,也要防范美国故技重施,再次像冷战时期那样摒弃西方价值观支持“泰式民主”以争取泰国政治保守派。对此,有必要拓展对泰政治交流的层次与范围,尤其是要加强与其新生代地方豪强政治势力的沟通与合作,夯实泰国对华合作的政治基础,自下而上形成有效制约,避免发生结构性的政治风险。

其次,要在安全领域补齐机制化短板。近年来,中泰安全合作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成效明显,但在机制化水平上与美泰相比依然相去甚远。从中长期来看,要进一步提升中泰安全合作水平,必须在机制化方面多做工作,争取在常态化合作中培养默契,磨合提升双方的“互操作性”。

再次,要在经济领域巩固增量发展优势。一方面要着力推进中泰高铁建设项目,依托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提升经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要加强泰国东部经济走廊与中国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兴产业对接,通过国际与地区产业链重构,提升经济合作的精度与高度。

最后,要在文化领域拓展多元化纽带。不仅要做好传统文化交流,更要重视引导泰国对中国现代文化的理解与认知,讲好当代“中国故事”;不仅要开展官方文化合作,更要采取政府服务外包方式,做好1.5轨与二轨的民间文化交流与合作,开展“润物细无声”的文化互鉴;不仅要在人员往来特别是留学生教育等方面扩大规模,更要加强精细化管理,形成可持续发展,避免引发不必要的误解与质疑。

注释:

- [1]“ASEAN Outlook on the Indo-Pacific”, June 23, 2019, <https://asean.org/asean-outlook-indo-pacific/>.
- [2]Peera Charoenvattananukul, *Ontological Security and Status-Seeking: Thailand's Proactive Behaviour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20, pp. 5-12.
- [3]“The speech delivered by Prime Minister Prayut Chan-o-cha at the opening of the 70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Bangkok Post*, October 1, 2015, <https://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713076/prayut-un-speech-full-text>.
- [4][11][18][47][53][105] การประกาศแผนแม่บทภายใต้ 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ชาติ (พ.ศ. ๒๕๖๑ - ๒๕๘๐) (๒) ประเด็น 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2018-2037)第二部分·外交事务》), 泰国总理府,《政府公报》第136卷第51辑,2019年4月18日,第3-4、3-4、1、8、1、3-4页。
- [5][10][14][24]“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pp. 1, 21, 21, 7-10.
- [6][26][48]“2017 Foreign Policy White Paper”, Australian Government, November, 2017, pp. 1, 7, 3.
- [7]Shinzo Abe, “Address by Prime Minister at the Opening Session of the Sixth Toky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frican Development (TICAD VI)”, August 27, 2016, https://www.mofa.go.jp/afr/af2/page4e_000496.html.
- [8][31][50]Narendra Modi, “Prime Minister's Keynote Address at Shangri La Dialogu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June 1, 2018, <https://www.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9943/Prime+Ministers+Keynote+Address+at+Shangri+La+Dialogue+June+01+2018>.
- [9][泰国]黎道纲:《泰国古代史地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 [12]胡波:《美国“印太战略”趋势与前景》,《太平洋学报》2019年第10期,第24-25页。
- [13]David K. Wyatt, *Thailand: A Short History (2nd Ed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261.
- [15]Ben Dolven and Bruce Vaughn, et al., “Indo-Pacific Strategies of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ssues for Congress”, Con-

- 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46217, January 30, 2020.
- [16] Scott W. Harold, et al., *The Thickening Web of A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Deepening Defense Ties among U.S. Allies and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2019, p. 5.
- [17][35][46] นโยบายและแผนระดับชาติว่า ด้ วยความมั่นคงแห่ง ชาติ พ.ศ. ๒๕๖๒ - ๒๕๖๕ (《国家安全政策与计划 (2019—2022)》), 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泰国总理府, 《政府公报》第 136 卷第 124 辑, 2019 年 11 月 22 日, 第 4、3-4、4 页。
- [19] คำแถ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พลเอก ประยุทธ์ จันทร์ โอชา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แถลงต่อ อรัฐสภา(巴育·占奥差总理向国会发表的内阁政策声明), 2019 年 7 月 25 日, 第 6 页。
- [20]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2013, p. 2.
- [21] 《平成 31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について》(2019 年防卫计划大纲),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決定, 2018 年 12 月 18 日, 第 2 页, <https://www.mod.go.jp/j/approach/agenda/guideline/2019/>。
- [22][62]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p. 25, 41.
- [23] Jim Mattis,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harpening the American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anuary 19, 2018, p. 2.
- [25][28] 孟晓旭:《日本“印太构想”及其秩序构建》,《日本学刊》2019 年第 6 期,第 31、49 页。
- [27] Brendan Taylor, “Is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 illus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6, No. 1 (2020), pp. 95-109.
- [29][49] 葛建华:《试析日本的“印太战略”》,《日本学刊》2018 年第 1 期,第 71、68 页。
- [30] 吴怀中:《安倍政府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日本学刊》2019 年增刊,第 122 页。
- [32] Frederic Grare, “The India-Australia Strategic Relationship: Defining Realistic Expecta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rch 2014, p. 1.
- [33][90] 楼春豪:《印度的“印太构想”:演进、实践与前瞻》,《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44 页。
- [34] ประภัสสร เทพชาตรี (布拉帕德·特普查德利): สงครามเย็น 2020 (冷战 2020), 2020 年 3 月 1 日, <http://www.drprapat.com/%e0%b8%aa%e0%b8%87%e0%b8%84%e0%b8%a3%e0%b8%b2%e0%b8%a1%e0%b9%80%e0%b8%a2%e0%b9%87%e0%b8%99-2020/>。
- [36][52] การประกาศแผนแม่บทภายใต้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ชาติ (พ.ศ. ๒๕๖๑ - ๒๕๘๐) (๑) ประเด็น ความมั่นคง (《国家发展战略总体规划 (2018—2037) 第一部分·安全事务》), 泰国总理府, 《政府公报》第 136 卷第 51 辑, 2019 年 4 月 18 日, 第 27 页。
- [37] 陈积敏:《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进程、影响与前景》,《和平与发展》2019 年第 1 期,第 14 页。
- [38]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Visit to Japan Strengthens the United States-Japan Alliance and Economic Partnership”, Fact Sheets,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6,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s-visit-japan-strengthens-united-states-japan-alliance-economic-partnership/>。
- [39] Michael R. Pompeo, “America’s Indo-Pacific Economic Vision”, 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 July 30, 2018, <https://www.state.gov/remarks-on-americas-indo-pacific-economic-vision/>。
- [40] “Joint Statement of the Govern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ustralia, and Japan”, Statements & Releases,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7,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joint-statement-governments-united-states-america-australia-japan/>。
- [41] “Remarks by Vice President Pence at the 6th U.S.-ASEAN Summit”, The White House, November 14, 2018,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vice-president-pence-6th-u-s-asean-summit/>。
- [42] 《外交青書 2018》(外交蓝皮书), 日本外務省, 2018 年, 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s10202。
- [43] “India-Japan Joint Statement during the visit of Prime Minister to Japan”,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November 11, 2016, <https://mea.gov.in/bilateral-documents.htm?dtl/27599/IndiaJapan+Joint+Statement+during+the+visit+of+Prime+Minister+to+Japan>。

- [44] Narendra Modi, “Prime Minister’s Speech at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fDB), Gandhinagar”,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 Government of India, May 23, 2017, [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 dtl/28478/Prime+Ministers+Speech+at+the+inauguration+of+the+Annual+Meeting+of+the+African+Development+Bank+AfDB+Gandhinagar+May+23+2017](https://mea.gov.in/Speeches-Statements.htm?dtl/28478/Prime+Ministers+Speech+at+the+inauguration+of+the+Annual+Meeting+of+the+African+Development+Bank+AfDB+Gandhinagar+May+23+2017).
- [45] “日印首脑会谈”(日印首脑会谈), 外務省, 2017年9月14日, https://www.mofa.go.jp/mofaj/s_sa/sw/in/page4_003293.html.
- [51] “Ensuring Secure Seas: Indian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Integrated Headquarters, Ministry of Defence (Navy), 2015.
- [54] “U.S. Relations With Thailand: Bilateral Relations Fact Sheet”, Bureau of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1, 2019, <https://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thailand/>.
- [55] 余定邦、陈树森:《中泰关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0-349页。
- [56] Moshe Lissak, *Military Roles in Modernization: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Thailand and Burma*,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76, p. 94.
- [57] Robert J Muscat,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Foreign Ai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65.
- [58] สรชาติ บารงสาข(素拉差特·邦穆鲁萨克):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พิเศษ ไทย-จีน ภูมิทัศน์ใหม่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中泰特殊关系: 泰国外交新局勢), มติชนสุดสัปดาห์ (民意周刊), 2017年7月6日, https://www.matichonweekly.com/column/article_43670.
- [59] [79] Kitti Prasirtsuk, “An Ally at the Crossroads: Thailand in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Michael Wesley (ed.), *Global Allies: Comparing US 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 Canberra: ANU Press, 2017, pp. 115-132, 117.
- [60] 周方治:《泰国政党政治重返“泰式民主”的路径、动因与前景》,《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1-28页。
- [61] “Remarks of Assistant Secretary Daniel Russel”, Institute of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Bangkok, Thailand, January 26, 2015, <https://th.usembassy.gov/remarks-of-assistant-secretary-daniel-russel/>.
- [63] 刘琳:《美国<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勾勒“印太战略”框架》,《世界知识》2019年第3期,第46页。
- [64] “Forging Just and Accountable Governance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USAID, June 19, 2019, p. 2, https://www.usaid.gov/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1861/USAID_and_the_Indo-Pacific_Transparency_Initiative_-_Fact_Sheet_June_19_2019.pdf.
- [65] [77] [78] “The Future of Thai-U.S. Relations: Views of Thai and American Leaders o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Ways Forward”, White Paper, Project to Strengthen Relations between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sia Foundation, August 2018, pp. 21, 12, 16-17.
- [66] [72] Zachary Abuza, “America Should Be Realistic About Its Alliance with Thailand”, *War on the Rocks*, January 2, 2020, <https://warontherocks.com/2020/01/america-should-be-realistic-about-its-alliance-with-thailand/>.
- [67] “What is JUSMAGTHAI?”, Join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hailand, <http://www.jusmagthai.com/main.html>.
- [68] Jennifer Morrison Taw,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Case studies in US IMET Training and Its Role in Internal Defense and Development*, Santa Monica: RAND, 1994, p. 22.
- [69] Michael Connors, “Thai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yond Hegemony?”, in M. Beeson (ed.), *Bush and Asia: America’s Evolving Relations With East Asia*,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42.
- [70] Thitinan Pongsudhirak, “Thailand’s Twin Transi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ce Sector”, in *Security Outlook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NIDS Joint Research Series No. 16,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18, pp. 91-92.
- [71] John Blaxland and Greg Raymond, “Tipping the Balance in Southeast Asia? Thail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Strategic & Defence Studies Centre, ANU College of Asia & the Pacifi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November 2017, pp. 14-15.

- [73] “Joint Vision Statement 2020 for the U.S. – Thai Defense Alliance”,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Thailand, November 17, 2019, <https://th.usembassy.gov/joint-vision-statement-2020-for-the-thai-u-s-defense-alliance/>.
- [74] 《泰国总理巴育会见魏凤和》, 新华网, 2019年11月1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17/c_1125242224.htm。
- [75] [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国政府联合新闻声明》, 新华网, 2019年11月5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11/05/c_1125194826.htm。
- [76] “Economy First for New US Ambassador”, *Bangkok Post*, March 12, 2020,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76584/economy-first-for-new-us-ambassador>.
- [80] Aekarach Sattaburuth, “Govt too submissive to China”, *Bangkok Post*, February 26, 2020, <https://www.bangkokpost.com/thailand/politics/1865574/govt-too-submissive-to-china>.
- [81] 周方银、王婉:《澳大利亚视角下的印太战略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1期,第36页。
- [82] 葛建华:《东盟战略自主与欧版“印太战略”》,《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第38-57页。
- [83] Thitinan Pongsudhirak, “Thailand: Military Resurgence and Geostrategic Imbalance”, in *Security Outlook of the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Defense Sector*, NIDS Joint Research Series No. 1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16, p. 80.
- [84] Christophe Jaffrelet, “India’s Look East Policy: An Asianist Strategy in Perspective”, *India Review*, Vol. 2, No. 2 (2003), pp. 35-68.
- [85] Ashok Sajjanhar, “India-Thailand Relations: A 70-year Partnership”,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September 15, 2017,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thailand-relations-a-70-year-partnership/>.
- [86] 马银福:《日泰关系:特点、动因与前景》,《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9年第3期,第87-89页。
- [87]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閣議決定, 2013年12月17日, 第4页, <https://www.cas.go.jp/jp/siryoku/131217anzenhoshou.html>。
- [88] 安倍晋三:《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安倍首相在第193次国会会议上的施政报告), 首相官邸, 2017年1月20日, https://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
- [89] Ryan Hartley, “Contemporary Thailand – 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What Falling Japanese Investment Reveals about Thailand’s Deep, Global Competition, State in the Context of Shifting Regional Orders”,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 4, No. 3 (2017), pp. 569-585.
- [91] Prashanth Parameswaran, “Both Modi and Prayut Have Big Plans for Closer India-Thailand Ties”, *World Politics Review*, July 15, 2016, <https://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9369/both-modi-and-prayut-have-big-plans-for-closer-india-thailand-ties>.
- [92] 王春燕:《印缅泰国际高速公路建设背景、现状及其影响研究:印度视角》,《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4期,第49-57页。
- [93] Mark Shawn Cogan and Vivek Mishra, “India – Thail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do – Pacific Resolve”, *Journal of Asia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20, pp. 1-21.
- [94] Pavin Chachavalongpun, “China’s Shadow Looms Large in Japan-Thailand Relations”, *The Japan Times*, March 3, 2017, <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7/03/03/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chinas-shadow-looms-large-japan-thailand-relations/>.
- [95] Masaya Kato, “Japan to join bid for Thai radar system contract”, *Nikkei Asian Review*, March 11, 2018, <https://asia.nikkei.com/Politics/Japan-to-join-bid-for-thai-radar-system-contract>.
- [96] John Bradford, “Understanding 50 Years of Japanese Maritime Security Capacity 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2018, <http://www.nids.mod.go.jp/english/publication/backnumber/pdf/20180905.pdf>.
- [97] Corey Wallace, “Leaving (north-east) Asia? Japan’s southern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4, Issue 4 (July 2018), pp. 893-897.
- [98]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促进中日泰三方企业互利共赢》, 中央广电总台国际在线, 2019年4月3日, <http://news.cri.cn/20190403/a86764ae-df36-e284-48c0-7489c37f8516.html>。

- [99]张继业:《日本推动东盟国家互联互通建设的政策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3期,第53-61页。
- [100] GMS Secretariat, *Review of Configuration of 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Economic Corridors*, Manila: Asian Development Bank, November 2016, p. 5.
- [101] คานแถ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 พลเอก ประยุทธ์ จันทร์โอชา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 แถลงต่อรัฐสภา (巴育·占奥差总理向国会发表的内阁政策声明), 2019年7月25日, 第5-6页。
- [102]刘琳:《东盟“印太展望”及其对美日等国“印太战略”的消解》,《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4期,第72-90页。
- [103]Hiro Katsumata, “What Explains ASEAN’s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 *Pacific Affairs*, Vol. 87, No. 2 (June 2014), pp. 247-264.
- [104] ประภัสสร เทพชาตรี (布拉帕德·特普查德利): 4 ปี นโยบาย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นยุค คสช. (维和委时代的4年泰国外交政策), 2018年2月5日, <http://www.drprapat.com/4-%E0%B8%9B%E0%B8%B5%E0%B8%99%E0%B9%82%E0%B8%A2%E0%B8%9A%E0%B8%B2%E0%B8%A2%E0%B8%95%E0%B9%88%E0%B8%B2%E0%B8%87%E0%B8%9B%E0%B8%A3%E0%B8%B0%E0%B9%80%E0%B8%97%E0%B8%A8%E0%B9%84%E0%B8%97%E0%B8%A2%E0%B9%83/>.
- [106] “Joint Vision Statement 2020 for the U.S. – Thai Defense Alliance”, U.S. Embassy & Consulate in Thailand, November 17, 2019, <https://th.usembassy.gov/joint-vision-statement-2020-for-the-thai-u-s-defense-alliance/>.
- [107]Sahasak Phuangketkeow and Supalak Ganjanakhundee, “Thailand’s Chairmanship of ASEAN: Unshackling Thai Diplomacy and Charting the Association’s Way Forward”, *ISEAS Perspective*, No. 2 (January 7, 2020), pp. 3-6.
- [108]Jürgen Rüländ and Arndt Michael, “Overlapping Regionalism and Cooperative Hegemony: How China and India Compete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32, Issue 2 (2019), pp. 178-200.
- [109]《中南半岛三河流域合作机制提出首个五年总规划》,新华网,2018年6月1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6/17/c_1122997475.htm.

[责任编辑:占冰]

Thailand’s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Geo-gravity Balance Strategy for a “Medium Country”

ZHOU Fang-y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response to the geopolitical pressure caused by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promo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India and Australia, Thailand has formed a self-positioning of the “medium country” and the “essential but not critical sub-regional pivot”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iland believes that the roo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lies in the reshaping of regional order, which will increase regional security risks, but will also provide some stimuli for cross-regional connectivity and development, and will promot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s a result, Thailand adopted an active geopolitical strategy of “usi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main axis to maintain geopolitical balance; using Japan and India as two wings to disperse the gravity of large powers; and using ASEAN as the foundation to enhance the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trying to maintain the dynamic balance of the geo-gravity structure, so as to seek benefits and avoid harm, and even turn crises into opportunities.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Thailand’s sub-regional pivot, so as to prevent political risks, to fill in security shortcomings, to consolidate economic advantages, to expand cultural ties, and to steadily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no-Thai strategic cooperation.

Key words: Indo-Pacific strategy, US-Thailand relations, Sino-Thai relations, geo-gravity structure